

近代绥远地区的垦殖迁移与服饰演变

王童欣, 张竞琼*

(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在近代垦殖迁移的背景下,以人口迁移为视角,探寻大量移民进入绥远后对当地服饰产生的影响。以文献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基于近代移民史料与绥远各地县志,确定近代绥远人口迁移的时间、数量与来源,并对移民与原住民的服饰形制进行分析,最后对绥远在移民到达后发生的服饰变迁进行研究。发现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下,当地服饰发生了并行与融合的演变,且以中原移民服饰为主体,在保持少数民族特色的情况下,绥远当地服饰产生了差异化变迁。该研究结果丰富了华夏服装体系下的文明形态,对北方近代人口迁移下的服饰演变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近代;绥远;垦殖迁移;服饰演变

中图分类号:TS 94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1)03-0233-07

Reclamation Migration and Costume Evolution in Suiyuan Area in Modern Times

WANG Tongxin, ZHANG Jingqiong*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reclamation and mi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large numbers of immigrants on local clothing after entering Suiyuan. I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clothing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Suiyuan area since Suiyuan's residents have been mixed for a long time. This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method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ata of modern migration and the county records of Suiyuan, to determine the time, quantity and source of the migration of modern population in Suiyuan, and analyze the dress patterns of the immigrants and the aborigines, and finally studies the the clothing changes in Suiyuan after the arrival of immigrants. It is discovered that under the collision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local costumes have undergone a two-way evolution of parallel and integration. And with the majority of ethnic groups as the main body, the local costumes of Suiyuan have undergone differentiated changes while mainta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enrich the civilized forms of the Chinese clothing system, and have a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evolution of clothing under the migration of modern population in northern China.

Key words: modern times, Suiyuan, reclamation and migration, evolution of clothing

关于绥远地区的移民问题研究,相关学者已有不少成果。葛剑雄^[1]论述了近代中国境内的移民史,其对移民的原因、时间、地点、路线以及移民定居后产生的影响等进行阐述。牛敬忠^[2]、色音^[3]讨论了绥远地区的放垦以及移民的问题,并对社会文

化问题作出了相关的论述。但相关研究中将移民问题与服饰演变相结合较少,仅闫天灵^[4]对绥远地区移民定居后的服饰变化有所研究。

文中基于相关地区的地方志资料,对近代绥远地区的人口垦殖迁移状况进行调查,着重分析近代

收稿日期:2021-01-05; 修订日期:2021-03-13。

作者简介:王童欣(1996—),女,硕士研究生。

* 通信作者:张竞琼(1965—),男,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文化。Email:602519924@qq.com

中原地区大量向绥远移民及由此带来服饰演变的现象。

1 近代绥远地区人口迁移状况

绥远地区大都属于蒙古草原,自原有“封禁”政策取消以及相关的放垦移民政策出现,关内汉人,特别是邻省地区的汉人为寻求更好的生存,纷纷选择迁往绥远地区开垦蒙地^[1]。

1.1 绥远地区移民迁入时间与数量

汉民大量迁入绥远的时间多发生于 20 世纪初,即清政府颁布“放垦蒙地”与“移民实边”政策之后^[2-4]。在绥远地区解除“封禁”后,便有大量流民迁入。固阳县志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境内开始放垦,随后,……人口逐年增加”^[5]。武川县

志记载“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设武川厅后,境内大量放垦土地”^[6],包头市志中“清末,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包头地区约有汉族 173 万人”^[7]。

以包头市东河区志为例,可见绥远地区移民迁入的时间与数量。包头市东河区志中的人口变化见表 1^[8]。1870 年北方地区受“丁戊奇荒”影响,绥远地区的人口开始出现增长,达 2 万余人;1912 年东河区人口剧增,增长数量达到 4 万余人,超过以往增长数量的总和,成为近代增长人口数量最多的一年;1913—1923 年间绥远受战争灾害与瘟疫影响,人口呈现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民国以后,由于战争频繁,灾害不断,瘟疫流行,东河区人口发展速度缓慢”^[8]。由表 1 可见,20 世纪初东河区移民数量增长迅猛。

表 1 1740—1947 年东河区人口概况
Tab.1 List of population profiles of Donghe District from 1740 to 1947

朝 代	年 度		总户数、总人数		较上年度增减户数人口	
	年 号	公元/年	总户数	总人数	户 数	人 数
清朝	乾隆五年	1740	70	350		
	乾隆五十年	1785	600	3 500	530	3 150
	道光十四年	1834	1 500	10 490	900	6 990
	同治九年	1870	2 800	25 000	1 300	14 510
民国	民国元年	1912	13 941	68 094	11 141	43 094
	民国 2 年	1913	13 942	68 164	1	70
	民国 3 年	1914	14 000	43 243	58	-24 921
	民国 4 年	1915	14 001	43 801	1	588
	民国 5 年	1916	14 000	43 912	-1	111
	民国 6 年	1917	14 633	74 008	633	30 096
	民国 7 年	1918	14 971	74 091	338	11
	民国 8 年	1919	14 982	74 030	11	11
	民国 9 年	1920	14 983	74 041	1	11
	民国 10 年	1921	15 172	74 261	189	220
	民国 11 年	1922	15 191	74 361	19	100
	民国 12 年	1923	15 198	74 369	7	8

1.2 绥远地区移民来源

近代绥远移民的来源地多为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中原地区。清朝时绥远地区属山西省,为归绥道,民国时期划分为归绥省,外来移民大多来自原省、毗邻省份或隔省相邻的省份。自清政府放垦蒙地政策之后,绥远地区多地设厅,以便安置大量的外来移民。固阳县志中“放垦土地数量逐年增加,晋、冀、鲁、豫、陕、甘等地流民相继来此定居……”^[5],武川县志“……晋、冀、鲁、豫等地徙民相继来此定居,人口逐年增加”^[6],托克托县志“清代以后,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汉族人到土默川垦荒……”^[9],呼和浩特市志中“机械增长的人口,汉族为绝大多数。尤其是清末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到1912年(民国元年),归绥县人口已达242 906人,移民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区”^[10],由呼和浩特市志以及托克托县志资料中可以看出,迁入绥远地区的移民绝大多数为汉族;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地区,另有少量来自河南、甘肃等地区,总体以中原农耕地区为主。

2 绥远地区与迁出地区的服装形制

2.1 绥远地区服装形制

近代绥远原住民多为少数民族,多民族共同居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服装,其中以人口数量最多的蒙古族服饰为主。

蒙古族的服装样式以其传统服饰——蒙古袍为主,蒙古男女均着袍装,分夏袍和冬袍,其样式为:一般过膝,在领口、袖口以及边缘处皆有金银镶边,缀银质纽扣。蒙古族人在着蒙古袍时,腰间常配有鼻烟壶和刀箸;足部多穿皮马靴,靴头上翘,靴筒分为高腰和半高腰;头戴窄沿小帽。各地方志记录与此相符,如固阳县志中蒙古“男女皆喜欢穿长袍、靴子。男子多为宽领大袖……”^[5];呼和浩特市志中“冬季则穿皮蒙古袍。领部加‘贾哈’……”^[11],“蒙古族的帽饰,传统的样子是窄沿小帽……帽顶缀有红缨,帽前饰以银佛”^[11]。此外,清朝时蒙古服饰样式一度受满族影响而发生变化,《土默特志》记载“清朝时,蒙古族服饰逐渐满化,方领变为圆领,窄袖变为箭袖(马蹄袖),女子袍装无开衩,贾哈也被马褂代替……”^[12]清代喀尔喀赛音诺颜汗部男女传统服饰如图1^[13]所示。

蒙古袍衣料以皮、布或绸缎为主,腰间有绸制腰带,靴和帽也以皮或毡为主,夏季小帽、头巾用席与布制。相关地方志对此有所记录,呼和浩特市志中有:“冬季则穿皮蒙古袍,领部加‘贾哈’,用锦貂

皮制成,两头尖,作箕状,围在肩上^[11]”;集宁区志有“旧时平民多以黑蓝两色棉布制袍,富者或官长则以绸缎为主制作”^[14];固阳县志中“男子多为宽领大袖,左衽以成幅系绸系腰,不垂穗,戴火镰、烟包、蒙古刀。冬天戴狐皮制蒙古帽,夏天多光头或系布巾……”^[5]。



图1 清代喀尔喀赛音诺颜汗部男女传统服饰
Fig.1 Traditional clothing for men and women in the Yinnuoyan Khan of Khalkha, Qing Dynasty

2.2 迁出地区服装形制

绥远地区近代移民的迁出地点一般为山西、陕西以及河北、山东等中原地区,这里的服装形制是华夏文明前开包裹型的典型代表,具体分为袍服制与上衣下裳制。袍服制即长衫或长袍,一般为大襟,右衽,连袖,开衩;上衣下裳制至近代已演化为上袄下裙或上袄下裤,袄分大襟、对襟,裤通常为大裆裤,不分前后,多用带子扎住裤口。在寒冷的冬季,中原地区人们多穿棉袄,山西人也有穿大皮袄,这种大皮袄毛粗板厚,更能抵御风寒。

3 移民影响下绥远地区的服装演变

3.1 绥远服装与中原服装并行

近代,绥远地区移民在迁入初期,依旧保持其原出发地的穿着风习,绥远一部分当地居民也未受

其影响,双方服饰在绥远并行出现。在移民较多的县城,甚至出现了特定的移民文化圈。绥远各地县志中对服装进行记载时,专门区分汉族与蒙古族服饰。

1) 中原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为劳作时便于耕种,仍保持其原出发地的打扮,多穿着大襟长袍、对襟袄、大襟袄、腰子与上下两件等,并且有扎腿带的习惯。《土默特志》中汉族人民日常生活的“衣裳有长袍(有棉、夹之分)、大衫(即单长袍)、大袄(或棉或夹)、小袄(男女家常穿)等”^[12]”。呼和浩特志中汉民平日里“……一般民众具有地方特色的衣着约有如下几种。对襟袄:中间开襟、高领,有单、夹、棉各种,为男服。大襟袄:右侧开襟,高领,为女服。腰子:为背心式内衣,单布、夹、棉,男女均宜……”^[11]。集宁市志中汉民为便于劳作,通常“下衣均为不分前后的大裆裤,扎腿带”^[13],这与“山东冬季天气寒冷,人们多把裤脚管用丝织的、黑色的、扁而阔的带子,在近髁骨处扎起来,名为‘扎腿’,带子则名‘扎脚带’‘扎腿带’或‘腿带子’”^[15]形制一致,这说明绥远的中原移民在迁移后依旧保持其原出发地区的穿着打扮。

2) 绥远蒙古一般人家在节日庆典时保持其传统的服饰——蒙古袍,而富裕人家在平日也会穿着蒙古袍装。呼和浩特市志记载富裕人家:“冬穿皮蒙古袍,绸缎褂面,佩鼻烟壶、刀箸”^[11]。《土默特志》中有平日“除官员穿满服外,一般人仍着蒙古袍服”^[12]。集宁县志中描述一般的蒙古人家“凡盛宴庆典仪式,男女老少均穿长袍,头戴蒙古礼帽或彩色头巾”^[13]。反映了绥远本地居民服饰未受外来移民的影响,即蒙古人民仍保持其本地传统蒙古袍的着装。

从各地县志(如集宁、土默特)及呼和浩特市志中,将汉族与蒙古族服饰分开记载可以发现,汉族移民的部分服饰迁入绥远后未受本地服饰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依旧保持中原的服饰形制;蒙古本地的服饰也未受外来移民的影响,尤其是在盛宴庆典时,依旧保持传统的服饰形制。由此可见,绥远自移民涌入后,部分居民的穿着打扮在一定程度上各行其道,汉族服饰与蒙古袍服在绥远并行出现。

3.2 绥远服装与中原服装融合

随着移民事业的发展,移民进入后期阶段,双方交流频繁,多数居民相处融洽,着装方面各取所需,中原与绥远的服装形制随之发生了融合。迁入移民来自中原且大多为汉族农民,并以垦殖为目的,这与绥远地区的服装有些差异。迁入移民多为

劳动人民,绥远本地居民主动接受其谋生手段——耕种,随其带来的穿着打扮也在原住民中流传,对当地的服饰变迁产生影响。因此当汉族农民大量涌入绥远,本地居民积极学习垦种事宜,其服装逐渐吸收了中原的服饰形制;同时移民的服装也因与本地居民的交流而发生改变,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3.2.1 绥远服装的变化

1) 在服装形制方面,中原文化的快速传播,加之当地居民积极学习垦种事宜,使得绥远人民的袍装发生了变化,并吸收、采用了中原地区主腰子、短衣、裤褂、挂面大衣、布衫、布袄等形制。袍装的变化表现在领、腰及下摆。领的变化在于左衽变为右衽与对襟并见,将原先当地的传统服饰转变为中原常见的着装形式。原蒙古男子多为宽领大袖,左衽,以成幅彩绸系腰^[5],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土默特志》记载当地“短衣,右衽”^[12],且“对襟袄与右衽衣并见”^[12]可见其领边吸收汉族右衽与对襟的形制。腰部的变化在于以绳为带变为丝绸为带。《北虏风俗》中有原先蒙古人民“衣甚窄以绳准其腰而服之不以带束也”^[16]。后受汉族影响演变为腰带系腰,后兴和县志提到“蒙古族穿袍时,常以丝绸腰带系于腰间”^[17]。下摆的变化在于逐渐变短,方便下肢耕种劳作。原蒙古袍为“膝下可尺许”^[16],并不利于活动。移民迁入后,绥远人民受其耕作便利的影响,衣摆渐高。《土默特志》记载蒙古人民,在民国时期后“穿短衣的日渐多起来”^[12],包头市志中也有“民国后渐随汉俗,大多穿短衣”^[7]。绥远地区来自陕、晋的移民数量多,因此明显受到中原服饰形制特别是陕、晋的影响。山西人有穿“红主腰”的习惯,“红主腰”也为劳作中功能性极强的衣物。凉城县农民“多数人穿贴身背心,俗称‘主腰子’或‘腰子’,防寒取暖”^[18];包头市志中“民国后渐随汉俗,大多穿短衣。冬季,乌拉山、大青山前后部分牧民穿既轻且暖青羊皮挂面大衣”^[19];凉城县志中绥远服装“款式多中式裤褂,其褂为对开式,也有大襟式的(多为妇女穿用),立领……”^[18];《土默特志》中“贫苦蒙古多有穿汉式衣裤者,如‘蓝布夹袄、小白布衫、白单裤、布袜、黑鞋’等”^[12]。

2) 在服装配饰方面,绥远人民吸收、采用了中原地区的习俗,有红腰带、红腰子、红内裤、白布包头等形制。山西人有扎“红裤带”的传统习惯,凉城县农民也受其影响,即“每当逢九年时(俗以年龄为九的倍数时称逢九年),须系红色裤带,穿红色腰子、红色内裤”^[18]。此外,绥远人民还借鉴了山东、

山西等地用白布包头的习俗。托克托县志记载“夏季,多数农民罩白毛巾,少数戴草帽”^[20],另蒙古族妇女也吸收了汉族妇女的服装配饰,蒙古族“女子结婚时或有钱人家女子平时戴类似汉族凤冠金冠带帽”^[20]。

3)在服装衣料方面,①绥远本地居民开始学习耕种棉花等经济农作物;②因劳作时汗流浹背,为追求透气性与舒适性,绥远本地居民吸收、采用了中原地区的粗布衣料。此前,绥远原住民穿皮,新修清水河厅志中绥远“……列市无几,亦无异物奇货,即布帛寻常日用之需,悉自外来”^[21];《夷俗记》中有记载十六世纪中叶“衣以皮为之”^[12]。自移民迁入后,绥远农民“服饰多为粗布手工缝制,以蓝黑色为佳,兼着其他杂色,衣料都从河北、山西输入”^[18]。

3.2.2 中原服装的变化 中原移民的服装也受到原住民服饰的影响,并与蒙古人民服饰习俗产生了融合。

1)在服装形制方面,中原移民充分利用当地游牧业的优势,结合牲畜耕种田地,形成农牧相依的局势。为便于乘骑,中原移民服装由不开衩变为开衩,且常穿戴靴与红缨帽。《土默特志》中记载清代当地汉人所着衣衫变为“左右有衩”^[12];蒙古人民穿着的靴出现在汉族移民的服饰记载中,“靴:底厚,勒高至膝下……”^[12],蒙古人民常戴的红缨帽也出现在《土默特志》记录汉族服饰的部分中,“入清以后,乃至民国,巾帽发展很快,样式种类很多,红缨帽、帷帽(凉帽)……”^[12]。

2)在服装配饰方面,汉族妇女也有佩戴蒙古族妇女的珊瑚珠串与银戒等风习。《土默特志》记载汉族女子亦戴“珊瑚珠子……并用丝绳串成长串,绕手腕上”^[12]。

3)在服装衣料方面,为适应当地自然地理环境,中原移民亦有穿着羊皮等皮质衣料。兴和县志描述汉族人民为保暖,“每到冬季,老年人常穿羊皮袄、羊皮裤”^[17];和林格尔县志同样记录汉民“冬季一般都穿棉衣或皮衣,农民穿皮衣为白茬,市民多挂布面”^[22]。

总之,因垦殖政策的下发与汉族移民迁入,绥远地区的服饰发生了明显的融合现象,并在随后的日常生活中逐渐以汉族服饰为主,蒙人传统服饰仅在民族节日时穿着。清水河县志内有记载,“民国后期,蒙古人逐渐改变原来的服式,只在盛大节日穿民族服装,平时穿着与汉族人一样。这是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结果”^[20]。

这一切表明,随着移民的迁入,两地人民长期混居,使得汉人与蒙人的服饰相互独立或交融,在形制、配饰、衣料等各方面出现了既有并行、又有融合的局面。

4 绥远地区服装演变因素

4.1 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的影响由纬度位置与地质土壤两个因素构成。其中,纬度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气候的变化,地质土壤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生产劳动的变化。

4.1.1 纬度变化因素 移民迁入后,绥远原住民服饰出现了中原地区的“主腰”与“挂面大衣”等。陕西、山西等地与绥远相比,纬度较低,海拔较低,一月温暖,七月凉爽;绥远地区与中原地区相比,纬度较高,海拔较高,一月寒冷,七月炎热。迁入绥远的固阳移民,面对生活环境的变化,不仅将中原的背心如“主腰”带入绥远以求清凉,更根据当地气候,穿着“挂面大衣”以御寒。同时,中原移民也根据绥远气候,穿着当地皮质衣料以御寒,五原县志载:“由于北疆气候寒冷,男女除穿长袍外,还习惯穿皮坎肩、皮大衣,戴兽皮制作的帽子……”^[23]。

4.1.2 地质土壤因素 移民迁入后,绥远当地的服饰出现了上衣下裤的形制,衣料除毛皮外还采用粗布。绥远地区移民多为农民并以垦殖为主,原住民向其学习垦殖,因劳作方式的变化,其服饰也发生了改变。绥远在移民进入以前,土壤利用以牧业为主,耕地较少,放牧乘骑较多,因此绥远人民多穿方便乘骑的袍类服装。中原人民土壤利用以耕地为主,平时常以工具垦地,为垦殖便利,多着上衣下裤。自中原移民迁入后,将方便活动的上衣下裤带入绥远,绥远原住民便吸收了其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绥远原以牧业为主,可作为衣料原料的农作物种类稀少,衣料以毛皮为主;中原土地原以土地垦殖为主,盛产棉、麻等衣物原料,服装多以此为原料,并因其坚固耐用且方便廉价,便成为中原人民最常穿着的衣料。在中原移民迁入后,粗布便成为绥远除毛皮外最常见的衣料,托克托县农民,“其衣着以坚固耐用为目的,衣料多为染成蓝、黑两种颜色的土布……”^[20]。

4.2 文化融合

绥远地区移民迁入后服装发生的演变,是基于移民与原住民长期共同的生活,产生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中原与绥远的服装形制与结构

基本一致,在服装的穿着方式上都属于前开包裹型。但因地区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的不同,在服装上存在细节差异。

绥远地区多游牧业为主,属游牧文明。在游牧文明中牧畜占据重要地位,其生产周期以畜牧为主导。游牧文明依水草而生,是自由的、分散的、流动的,同时也是脆弱的。游牧民族各户距离较远,在水草用尽后便会搬离,^①为了方便牧畜饲养,^②为了给水草生长的时间。同时畜牧生产周期多为半年,在此期间,游牧民族无新增畜牧,具有一定的脆弱性^[24]。无论是其赖以存活的生产资料,还是穿着和食用的生活资料。基于游牧文明的特性,绥远居民的衣料多以牧畜毛皮为主,穿窄袖长袍类服装。

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属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中农作物占据重要地位,其生产周期取决于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农耕文明依水土而生,是稳定的、集中的、紧密的,同时也是封闭的。农耕文明是以村落为集体,相互联系密切,居住稳定,一般不搬离居住地,平日里也少出远门,具有封闭性^[25]。农耕文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农作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原地区土壤肥沃,农作物种类丰富,包括棉、麻等,生产以人力垦种为主。基于农耕文明的特性,中原人民衣料多为自制棉粗布,服装采用方便活动的上衣下裤形制。

绥远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经过长期共同生活,在精神与物质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融合,使得双方服装也产生了交融。在形制上,袍和上衣下裤形制的服装都在绥远流行,受气候与劳作方式影响,绥远居民吸收了农耕文明上衣下裤的形制,汉族居民吸收了游牧文明袍类的服装;在衣料上,皮料与粗布都被两种文明所接受,绥远居民吸收了农耕文明的粗布衣料,汉族居民吸收了游牧文明的皮质衣料;在精神上,两地文明截然不同又相互包容,向着多元一体的方向发展。游牧文明保持自身特点并影响着农耕文明,将少数民族长期形成的风俗带入中原人民的生活中,以帮助其更好地适应草原。自汉族大量迁入绥远,多数民族占据优势,农耕文明逐渐由客体向主体转变,为绥远人民带来了中原农耕文明,在日常生产中呈现出“隐而不彰”的状态^[28],两种文明朝着新的且多样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4.3 经济贸易

自移民迁入后,绥远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影响着人民的穿着风习。绥远在清中后期一直属于经济贸易相对落后的地区,绥远原住民对交易没有清

晰的认知,交换意识不强,其早期多穿着自制的皮衣,少有去市集中购买布料和成衣。

早期绥远地区的人们会与来自中原的商旅进行交流,一般都是以物易物。自清朝末期中原移民迁入之后,便在绥远形成了成熟的交易市集。市集上也出现了“市布”,有“经济富裕之户,以穿市布为荣”^[19]的现象。移民的到来带动了绥远地区经济贸易的同时,更促进了双方服饰习俗的融合。

5 结 语

文中以人口迁移为视角,基于 20 世纪初放垦蒙地招徕移民的政策,研究绥远地区的服饰演变。通过比较移民、原住民双方服饰形制,以及移民迁入后,当地的服饰演变可以发现,双方的服饰随移民迁入时间推移,发生了并行与融合的演化。

移民进入初期,绥远的一部分原住民固守当地习性,为保留传统文化而坚持其传统风俗,中原移民仍穿着其原出发地的服饰形制,原住民也保持原出发地的服饰形制,双方装束各行其道。移民进入后期,随着交流的深化,绥远的大部分原住民对中原移民产生认同感,主动在精神与物质方面吸收其文化,穿着打扮也由此出现了改变。

移民数量庞大,在进入早期,未融合于当地,成了独立文化圈,后期则求同存异,即保留了其出发地即中原地区的整体服装形制,又为适应迁入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改变了衣料、配饰等部分服饰。

人口迁移下的服饰演变是中原汉族与绥远原住民服饰的各自传承与发展,也是双方的相互融合与演变,是因迁移而产生地域文化变迁的代表性案例,为研究对中国其他地区服饰变迁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 [1] 葛剑雄,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59-510.
- [2] 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97-106.
- [3] 色音.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第11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 [4] 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0-33,209-221.
- [5] 《固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固阳县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525-574.
- [6] 武川县《武川县志》编纂委员会.武川县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603.
- [7] 包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包头市志:卷1[M].呼和浩

特:远方出版社,2001:345-347.

[8] 东河区志编委会. 东河区志[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315-334.

[9] 《托克托县志》编委会. 托克托县志:上[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152.

[10] 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 呼和浩特市志:上[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227.

[11] 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 呼和浩特市志:下[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670-688.

[12]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土默特志:上[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896-920.

[13] 内蒙古腾格里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蒙古族服饰图鉴[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99.

[14] 《集宁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集宁市志 全 2 卷:下[M]. 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1115-1128.

[15] 山曼. 山东民俗[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8:85.

[16] 萧大亨. 史料四编:北虏风俗[M]. 上海:广文书局,1972:15-16.

[17] 凉城县《凉城县志》编纂委员会. 凉城县志[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165-167.

[18] 包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包头市志:卷 5[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1:554-546.

[19] 《托克托县志》编委会. 托克托县志:下[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1029-1040.

[20] 忒莫勒. 新修清水河厅志[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9:149.

[21] 李志升. 兴和县志[M]. 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1059.

[22] 《和林格尔县志》编纂委员会. 和林格尔县志[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598.

[23] 五原县志编纂委员会. 五原县志[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760.

[24] 邢莉. 游牧文化[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1-37.

[25] 郭星云. 晚期农耕文明[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15-33,89-109.

[26] 齐木德道尔吉,徐杰舜.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260-406.

(责任编辑:卢杰)

(上接第 232 页)

[31] 李俞霏,梁惠娥. 明代织物纹样的智能提取——以斗牛袍为例[J]. 丝绸,2018,55(11):53-58.

LI Yufei, LIANG Hui'e. Intelligent extraction of patterns from Ming Dynasty fabrics: the case study of the bullfight robe[J]. Journal of Silk, 2018, 55(11): 53-58. (in Chinese)

[32] 杨秋生. 运河与城市变迁——以明代山东临清州为例[D]. 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12.

[33]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4] 赵维平.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35] 利玛窦,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M].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3.

[36] 唐宝水. 《漂海录》历史意蕴透析[D]. 延吉:延边大学,2009.

[37] 牛建强,汪维真. 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J]. 东北师大学报,1992(1):38-45.

NIU Jianqiang, WANG Weizhen. The change of fashion orienta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round jiangna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1992(1):38-45. (in Chinese)

[38] 周克虎. 明代江浙地区奢靡风气研究[D]. 宁波:宁波大学,2017.

[39] 杨吉超. 京杭运河与明清临清地区社会风俗变化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14.

[40] 陈江.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

[41] 李慕寒,沈守兵. 试论中国地域文化的地理特征[J]. 人文地理,1996(1):7.

LI Muhān, SHEN Shoubing. On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Chinese[J]. Human Geography, 1996(1):7. (in Chinese)

(责任编辑:卢杰)